

论黄侃对陶渊明诗学的接受

何卿澜

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

摘要：黄侃对陶渊明诗学的接受，既体现了学者严谨的历史理性，又彰显了个人独特的审美自觉。本文通过分析黄侃的诗学批评、理论阐释与创作实践，揭示其对陶渊明诗学的多维继承与重构。

关键词：陶渊明；黄侃；诗

引言：

黄侃（1886-1935），湖北蕲春人，名乔馨，廛名乔鼎，后更名侃，字季刚、梅君、季子，号运臂，别署病蝉、不佞、奇谈、量守居士。黄侃书斋名为“量守庐”，自号“量守居士”，这是出自陶渊明《咏贫士》中的“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”，黄侃以此表达他安贫守贱，淡泊名利的思想。而黄侃对于陶诗的喜爱远不仅如此，在《黄侃日记》中，他如实记录道：

（陶诗）驷马无赏患，贫贱有交娱。（侃案）“赏”，远也。“患”，虑也。“交”，近也。魏、晋人常用“交赊”字为远近。夜读陶诗“苍苍谷中树”“蔼蔼堂前林”二首，有所会，遂咏至百十遍。

“驷马无赏患，贫贱有交娱”是引用陶渊明的《赠羊长史》。黄侃对“赏”“患”等字词进行了细致的考订，他以咬文嚼字的态度，力图精准把握陶诗的语言与其魏晋时期的原貌。后者“苍苍谷中树”与“蔼蔼堂前林”，分别出自《拟古九首》和《和郭主簿》，黄侃因有所体会，便吟咏到了百十遍，这足以见得黄侃对于陶渊明诗歌的喜爱。

一、黄侃诗学批评

黄侃的诗学批评观念彰显出学者特有的历史理性与审美自觉，其核心可凝练为“考据求真”的学术品格。黄侃爱陶诗，但他又能公允地看待钟嵘将陶渊明仅置于《诗品》“中品”一事。

黄侃站在历史还原的批评立场，他对钟嵘《诗品》中陶渊明品第问题的历史还原式批评，体现了其诗学批评研究中“以古释古”的严谨态度。自宋以来，世人对钟嵘把陶渊明放在“中品”的位置上，是颇有微词的。而古直、陈延杰更是认为，“陶诗原属上品，迨至宋陈振孙著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则云上品十一人，是又不数陶公也”，即陶诗本应该在“上品”，因文本讹误，才变为“中品”。这些说法，都足以见得评论家们对陶诗的偏爱和对钟嵘将其定位在“中品”位置上的不满。黄侃虽也爱陶诗，但他也肯定了钟嵘对陶诗的评价“陶渊明诗，仲伟称其‘笃意真古’，‘为隐逸诗人之宗，可谓极其推赞。”他努力考据历史原貌，意图拂去后世主观臆断的尘埃，将钟嵘《诗品》置于魏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历史场域中考察。紧接着，他点明了众人指责钟嵘的原因：“自宋以来，文士因渊明之高节而并重其诗，遂

疑仲伟品评未当”。而后，他结合魏晋时期的文坛风貌，对陶诗进行了更为公允的评价，也更为客观地看待了钟嵘的评价，原文如下：

陶公之诗，托意高远，措语真质，自非卑陋尘俗者所能为。若论其风力，贴其辞采，虽略殊于孙、许，实未逮于晋初。盖缘无意为诗，所以不事研炼。惟其清风苦节，作表方来，奇语妙辞，间出篇内，故流传弥广，称誉弥高。若能玩索遗文，参验时序，乃觉钟氏所评，非为肤浅矣。

黄侃指出陶诗“托意高远，措语真质”“无意为诗，不事研炼”的创作特质，充分肯定了陶诗的价值。他敏锐捕捉到钟嵘所处南朝文学的特殊性。彼时玄言诗风占据主流，诗坛更倾向于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的审美观。陶渊明“措语真质”的诗风，既不符合玄言诗审美趣味，也与陆机、潘岳等西晋诗人“缛旨星稠，繁文绮合”的修辞追求也相去甚远。黄侃站在“以古释古”的批评立场上，参验时序，重新审视钟嵘将陶诗置于“中品”的内在逻辑，即在崇尚“丹采”与“风力”并重的批评体系中，陶诗的自然真朴反成其“未逮晋初”的审美短板。

尽管黄侃喜爱陶诗，但是他仍以历史还原的立场，肯定了钟嵘将陶渊明置于《诗品》“中品”的历史合理性。这种“以古释古”的考据方法，既体现出黄侃公允地看待陶渊明与钟嵘评价下的陶诗，又表现出黄侃对于陶渊明所处历史年代文坛的深入剖析，彰显出立足历史语境的学术理性。

二、“隐”与“秀”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篇说：“隐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独拔者也。隐以复意为工，秀以卓绝为巧。”黄侃对此还补文一篇，申说对于隐、秀的理解。黄侃首先从理论上对隐、秀二者加以说明。他认为对于“隐”的描述是这样的：

盖言不尽意，必含余意以成巧。

言含余意，则谓之隐。

隐者，语具于此，而义存乎彼。

隐以复意为工，而纤旨存乎言外。

情在辞外曰隐。

而他对于“秀”的阐释则是：

意不称物，宜资要言以助明。

意资要言，则谓之秀。

秀者，理有所致，而辞效其功。

秀以卓绝为巧，而精语峙乎篇中。

状溢目前曰秀。

他认为“隐”指“言不尽意，必含余意以成巧”的状态，即通过寄托、比兴等手法，使作品蕴含言外之意，如经书中的“陈古刺今”“举轻明重”之例。“秀”则指“意资要言，卓绝为巧”，即篇中自然生动的警句或精妙描写。也就是说，隐重寄托深意，秀重直观表现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陶渊明诗歌的含蓄深远，隐的文学形态“在陶渊明那里达到了最高境界”，这与黄侃所论“隐”与“秀”的特征高度契合。

陶渊明以平淡见深邃，展现出黄侃所欣赏的“隐”的特质。《饮酒》其五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画面，表层是农耕生活的日常图景，深层却暗含着作者隐居田园，心远地自偏，超脱世俗的追求。这种“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的表达方式，与“深文隐蔚，余味曲包”的“隐”的美学不谋而合。此外，《归园田居》中“羁鸟恋旧林”的比兴手法，既延续了《诗经》“陈古刺今”的微言传统，又借景抒情，在简淡语言中埋藏着对世俗樊笼的深刻解构。这不仅是陶渊明归隐山林、超脱世俗的隐者风范，也是其诗言不尽意、意

在言外的“隐”的特点。

陶诗中的“秀”并非刻意雕琢的警策之语，而是自然天成的意境呈现。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田园图景，以水墨写意般的笔触，在虚实相生间达成“状溢目前”的视觉效果。这种“自然会妙”的审美特质，诗黄侃所推崇的“思合而自逢，非研虑之所求”的状态，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云无心以出岫”的意象里得到极致展现。看似平淡的物象描写，因渗透着诗人超然物外的生命体悟，自然升华为令人回味的“秀”句。

“隐”与“秀”在陶诗中的共生状态，这也是黄侃“夜读陶诗，高歌遣闷”如此偏爱陶诗的原因。陶渊明将庄禅哲思融入日常经验，使《饮酒》组诗中“此中有真意”的玄远之境，与“飞鸟相与还”的具象画面形成微妙共振。这种以平淡见深邃，以自然天成的意境描摹诗心，是陶诗中“隐”与“秀”的融合。黄侃强调“隐秀之原，存乎神思”，在陶诗中具体化为“纵浪大化中”的生命体验与“欲辨已忘言”的艺术直觉的深度交融。

陶诗于平淡中见奇崛，在自然中寓警句，是符合黄侃在过补《隐秀》篇中对于“隐”与“秀”的解读，这也恰恰解释了黄侃痴迷于陶诗的原因。

三、创作实践

黄侃的诗学观念不仅体现在理论上，更浸润于其创作实践之中。他极为追慕魏晋诗风，尤好作五言诗，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对陶诗的喜爱和研读，如“屈子庄生、陶征士，吾之师也”。黄侃的《集陶诗》曾以集句形式重构陶渊明诗意，看似辑录旧句，实则是精妙剪裁，如：

开春理常业，时还读我书。虚室绝尘想，春醪解饥劬。

一士长独醉，不乐复何如？虽无纪历志，颇回故人车。

全诗八句皆出自陶渊明的不同篇章，如“开春理常业”出自《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》，“时还读我书”则出自《读山海经》。除此以外，其他几联的诗句分别源自《归园田居》《和刘柴桑》《饮酒》《读山海经》《桃花源诗》《饮酒》。也就是说，黄侃的《集陶诗》是集合陶渊明的诗句，通过重新编改，形成浑然天成的隐逸图景。

黄侃集陶渊明诗句而成的《集陶诗》，折射出黄侃所追寻的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两极：一面是归隐田园的冲淡平和，一面是猛志常在的志士本色。首联撷取陶渊

明躬耕与读书两大意象，构建出“既耕亦已种”的生存智慧。春耕时节顺应天时的劳作，暗合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冲淡平和；诗书相伴的耕读生活，则是对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实践。黄侃在此凸显陶渊明“虚室绝尘想”的澄明心境。通过疏离世俗纷扰，在田园牧歌中实现精神净化，获得“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”的超然。而“一士长独醉，不乐复何如”此句以反诘语气揭破“独醉”表象下的精神孤愤，是猛志常在的志士本色。黄侃专门选择了“独醉”，既魏晋名士风流相契合，更凸显了黄侃这些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中坚守精神高地的自觉。这种醉非沉湎杯酌，而是以佯狂姿态对抗现世浑浊，与陶渊明“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醉人”形成跨时空呼应。由此可见，黄侃一首《集陶诗》便将陶诗的冲淡平和与金刚怒目展现出来了。

此外，在创作中，陶渊明与黄侃对于“酒”均有

着独特的偏爱。陶渊明嗜酒，其《饮酒》诗便有二十首。黄侃亦是如此。在2016年版中华书局的《黄季刚诗文集》中，关于“酒”出现的次数就有720多次。程章灿还在《黄季刚先生与酒》中便结合《黄侃日记》详细论述了黄侃好酒、诗酒雅集之际的才学交锋与酒对他性格的影响。可以见得，“酒”在陶渊明与黄侃是相当重要的。以《集陶诗》为例，当饮酒时，醉意中始终埋藏陶渊明“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”的郁结，也滋养着黄侃夜中不能寐的苦闷。这是冲淡平和与金刚怒目中间的灰色地带，是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之间的摇摆。

黄侃的诗学观念不仅体现在理论上，还表现在创作实践中。黄侃的《集陶诗》集陶而不泥陶，黄侃通过陶诗碎片的重新书写，既保持着与原作的互文，又注入了黄侃自我的解读。

结 语：

综上，黄侃对陶渊明诗学的接受，不仅是理论上的溯源与阐释，更是通过创作实践实现的精神对话。他以历史理性还原陶诗原貌，以审美自觉挖掘其美学价值，最终在创作实践中完成了对陶渊明诗学的继承与重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黄侃：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。
- [2] 黄侃：《黄季刚诗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16。
- [3] 黄侃：《黄侃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。

[4] 袁行霈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。

[5] 戴建业：《澄明之境 陶渊明新论 戴建业作品集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9。

[6] 赵建章：《魏晋南北朝文论范畴的现代阐释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24。

[7] 杨明：《黄侃先生补〈隐秀〉篇蠡测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2年第3期。

[8] 程章灿：《黄季刚先生与酒》，《文史知识》2002年第5期。

作者简介：何卿澜（2001—），女，江苏昆山人，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。